

牡丹江抗日十四年

中共牡丹江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综 述

孙联军

牡丹江市，是祖国东北边陲的一座新兴工业城市。牡丹江市是以流经这块美丽而丰沃的土地的母亲河——牡丹江作为城市的名字的。

牡丹江，发源于吉林省敦化市的牡丹岭，从牡丹岭源头流出后，一路上穿山越岭，千回百转。最早居住在江两岸的满族人便给她取了名字，叫“牡丹乌拉”，意思是“弯曲的江”。1903年，沙皇俄国修筑中东铁路时，在这里设置了一个车站，站址即现在的文化广场。因车站的南面不远处就是日夜奔流的牡丹江，便把这个车站以江的名字命名为“牡丹江站”。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车站的设立，人多了起来，车站的名字越叫越响，越传越远，逐渐成了这个城市的名字。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全境。从1932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踏上牡丹江这块土地，到1945年9月28日，发生在东宁要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场战斗，日本帝国主义被赶出牡丹江，富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牡丹江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长达十四年头的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

(一)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牡丹江后，出于独占中国，并相机进攻苏联的野心，一直把牡丹江地区作为战略重点，调动关东军精锐部队，对以牡丹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野蛮的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侵略和军事“讨伐”，对牡丹江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牡丹江后，政治上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宪兵、特务、密探遍布，禁止集会结社，禁止讲古论今，稍有不慎，即被冠以“思想犯”、“国事犯”等莫须有的罪名而遭逮捕、毒打、监禁、杀害。各地都设置了大量的看守所、“矫正院”、监狱，甚至水牢，许多仁人志士乃至无辜平民在这些地方受尽折磨。当时的“东满总省模范监狱”（在现牡丹江市阳明区铁岭河镇）一处关押的抗日勇士和爱国人士等就有 400 多人。为了切断抗日武装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实行保甲法和建设集团部落等法西斯统治措施。1933 年至 1938 年，仅在林口县就多次归屯并户，凡山间谷地零散住户，可能与抗日武装有联系的边远村屯，一律放火烧毁，六年间共计焚烧百姓房舍一千余栋。集团部落四周建有碉堡、岗楼，砌围墙，挖水壕，架铁丝网，集团部落的住户一律持有“证明书”，不得随便出入，一家通“匪”亲戚邻居同“罪”论处，集团部落就是人间地狱。日本帝国主义还到处抓劳工，或者以各种手段使平民百姓沦为劳工，他们在日伪皮鞭和刺刀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或者为日本帝国主义淘金、伐木、修筑军事设施，整日衣不遮体，食不裹腹，数不清的劳工在苦不堪言的统治和折磨下，悲惨死去。而为日本帝国主义修筑军事设施的劳工生存下来的更是微乎其微。当年日军修筑东宁要塞，征用劳工达 17 万多人，而工程完工后，为了保密，以转移施工地点为名，将所有劳工集体杀害！牡丹江地区发现的多处“万人坑”，那累累的白骨，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永远抹杀不了的铁证。日本帝国主义还强征妇女做“慰安妇”，仅在东宁县的“慰安妇”人数就达一千多人。那些饱受日军摧残蹂躏的无辜女性，

许多人被迫害致死，许多人在日军败退时被杀。而侥幸活下来忍辱含垢到今天的那些当年的“慰安妇”，就是对没有人性的日军罪行的有力地揭露。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牡丹江后，对牡丹江的丰富资源进行了全面而疯狂的掠夺，尤以黄金、煤炭、木材为甚。从1935年到1940年间，仅在林口和穆稜掠走的黄金每年都在二万两左右；煤炭资源，仅东宁一县，1938年的年产量即达五万吨；而木材资源更遭到史无前例的掠夺，仅1938年一年的砍伐量即达40万立方米！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掠夺，不仅抢走了牡丹江地区数不尽的财富，而且更为严重地是破坏了牡丹江地区的资源和生态环境，这种破坏的影响有的已无法挽回，有的至今还在持续。日本帝国主义还大肆掠夺牡丹江地区的土地资源。从1937年始，日本帝国主义加速推行“移民满洲”的侵略政策，意欲20年内向满洲移民100万户，500万人，使满洲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为日本人。至1945年日军投降前，共计移民32万多户于中国的东北地区，其中以牡丹江地区为多。这些开拓团名目繁多，任务是“平战结合”。开拓团多拥有武装，平时种地并参加军事训练，遇有战事立即开往前线，其中青年义勇队开拓团则完全是侵略者的后备力量。这些开拓团，以强制手段低价“购买”中国农民辛勤开垦的土地，使广大农民因失去土地而背井离乡，更多的则被驱赶到边远地区，或被捉去当劳工。这些开拓团生产的粮食大量地运回日本。开拓团移民政策，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永久占领中国的侵略野心。至今健在的许多日本遗孤、遗属，就是为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侵略行径出具的铁证。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永久奴役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上，强制推行奴化教育，把日语定为“国语”，学校的校长、主事都由日本人担任，任意篡改历史，宣传“东亚共荣”，利用广播宣传王道乐土，用封建反动的伦理道德毒害青少年，妄图从根本上同化中华民族，其用心何其毒也！

为了扑灭牡丹江地区的反日怒火，日本帝国主义调动关东军精锐部队对抗日武装进行经常性的“讨伐”，残害了无数抗日勇士和平民百姓，龙爪惨案、梨树沟惨案和东宁三岔口惨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典型事例。特别是“七·七”芦沟桥事变前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东北这个侵占全中国的后方基地，多次集中数万大军对牡丹江地区的抗日武装进行疯狂的围剿，千万抗日战士血洒林海雪原。日本帝国主义在使用精良的常规武器屠杀中国人民的同时，还研制、试验化学和细菌武器。设在海林城东四华里处福利屯的643支队、设在林口古城镇的关东军第162细菌研究所、设在拉古的141支队等，都是以731部队为核心的生化武器部队。这些灭绝人性的部队，不仅使许多中国人被作为试验品而悲惨死去，而且使驻地附近的人畜也受到伤害。一直到1982年7月16日，在牡丹江市光华街的市政工程施工时，挖出贮有芥子气的容器，不幸的施工者被严重伤害，侵略者又留下了新的罪证。

(二)

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牡丹江人民，自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铁蹄一踏上这块土地，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抗日军侵略的抗日斗争，牡丹江地区是众多抗日武装抗击日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武装，经过几个发展时期后来形成的东北抗日联军十一个军，在牡丹江地区从事抗日斗争的就有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军等，其中四、五、七、十军都是在牡丹江地区先后组建并主要活动在牡丹江地区的。

应当说，我党领导的武装在牡丹江地区是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开始建立发展的。虽然马骏等革命先驱很早就开始在牡丹江撒播革命火种，但由于当时的东北地区，党组织建立的时间晚，力量相对薄弱，国民党东北军遍布各地，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地区。因此，“九·一八”事变前，在牡丹江地

区尚无实际意义的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大好河山沦陷敌手。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民族抗日的正确主张。党的抗日主张，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得到了东北沦陷区各阶层人民的普遍拥护，自发的抗日武装纷纷揭竿而起，举旗抗日。这些自发的抗日武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民间自发的“拉竿子”式的，象海林西山八大队、平南洋总队等；另一类是原国民党东北军中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中、下层官兵，在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在人民群众自发抗日活动的感召下，也举起了抗日义旗，并成为日军侵占东北之初主要的抗日武装。牡丹江地区的党组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实际斗争的需要，白手起家，着手建立党领导的武装，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十分困难。基于这种情况，也基于当时我党在东北尚无一兵一枪的实际，“九·一八”事变后，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都强调：“各省委应该派大批同志到白军中去”，“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和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中共满洲省委对牡丹江地区的抗日斗争十分关注。1931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中共宁安县委扩建为中共宁安中心县委，领导宁安、穆稜、密山、东宁各县的抗日斗争。1932年1月在牡丹江建立中共吉东局，指示党的干部进入自发的抗日武装进行争取改造工作。根据党的这些指示，1932年宁安县委就派共产党员于洪仁同志到李荆璞的“反日自卫队”做工作，首先教育争取了该队总队长李荆璞，使之接受先进思想，并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改造这支自发的农民武装奠定了基础，又派共青团员朱光（赵金城）进入南湖头大刀会，用拜把兄弟的方式首先争取首领王汝起，然后逐步改造整个队伍。1934年又派从北平来的大学生伊俊山、赵永新、冯朴及石头河子来的党团员马连山、崔展作、宋一夫（后叛变），八道河子朝鲜族党员十余人，上马河党员黄志信等人，分别进入柴世荣、傅显明、王毓峰的部队进行宣传、教

育、改造工作。后来成为抗日联军著名将领的周保中、李廷禄也是在这个时期根据党的指示进入王德林部的。经过这些党团员的艰苦工作，逐步将这些部队改造成为党在牡丹江地区的基本武装力量，使当时的许多旧军官、山大王先后成为共产主义先锋战士，成为党的军事将领，其中多数人先后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事实证明，这种方式是符合当时的实际和完全成功的。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独霸中国而欲使东北成为巩固的后方基地，因此，侵略的铁蹄一踏入，便首先集中关东军精锐部队对东北地区的抗日力量进行残酷的围剿。因为党的力量还很薄弱，特别是党还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作为领导核心形成实际意义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党的抗日主张并没有被自发的抗日武装所真正接受，加之各种自发抗日武装自身思想、队伍诸方面的严重不纯，很快就被日军各个击破而溃散失败。我党也估计到这种形势，《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决议》中，一方面强调派干部进入各种自发抗日武装中去做团结、教育、改造工作，同时强调另一方面“须努力建立党独立领导的中心部队，来独立地发动与领导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当时的绥宁中心县委，1932年底召开会议，讨论分析当时的形势，也正确地指出：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自卫军、救国军等会很快溃散，党必须尽快掌握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武装。正是根据这些指示精神，当初进入各自发抗日武装做团结、教育、改造工作的党、团员，于各种自发抗日武装溃散之际，将秘密掌握的武装聚拢起来，转而成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从此，拉开了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在牡丹江地区进行抗日斗争的崭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成为这一地区抗日民族斗争的领导核心。牡丹江地区党直接领导抗日斗争的历史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在民族命运的发展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

以李廷禄领导的抗联四军和周保中领导的抗联五军为代表的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建立后，即同日伪军展开了坚决的战斗，

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由于受当时党内李立三、王明等错误路线的影响，党改造、联络的部队人数不多、素质也不很高，特别是在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党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经历对这些队伍进行严格的教育、培训；即使党自己建立的赤色游击队，也多是各自为战，小规模地袭扰敌人；作为根据地的密营规模小，群众基础既不够广泛也不够牢固，这些都为此后抗日斗争的艰难埋下了自身因素的伏笔。但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于各种自发抗日武装溃散的民族危亡之际，用近乎原始的武器，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毅然担负起拯救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以抗联第四军和第五军为骨干，在抗击日军的过程中，改造收编了一些义勇军余部和山林队，逐渐增设了七、八、九、十、十一军等建制，人数最多时达到数万人，形成了抗日斗争的高潮。但日本帝国主义出于独霸中国和择机进攻原苏联的战略野心，于1935年出台了国策“牡丹江中心主义”，核心是要把牡丹江建成重要的战略基地。所以，一直把牡丹江地区作为经济封锁、思想奴化、军事剿杀的战略重点；尤其是“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从其战略全局考虑，面对牡丹江地区如火如荼的抗日烽火，为巩固这一重要的战略基地，于1938年初调集了3个日军旅、4个靖安团共计7万余人，不久，兵力又增加到10万人，对牡丹江地区进行了空前的讨伐。同时，加紧推行经济封锁、“集团部落”、“保甲连坐”等法西斯统治方式，使抗联活动进入困难时期。抗联的将士们为配合全国的抗日斗争，主动出击，袭扰敌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1938年，为突破敌人困而歼之的铁壁合围，打通与南满抗日武装的联系，牡丹江地区的抗联武装四、五、七、八、十军及东北义勇军姚振山部和王荫武的救世军根据吉东省委的指示，统一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分两路进行西征。历时两年，西征将士们在武器落后、弹药缺乏、衣食不足的条件下，与数倍于己，装备精良的

敌人浴血奋战，殊死战斗，写下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牡丹江地区抗击日军的最悲壮的一页。在敌人的军事进攻、经济封锁、政治瓦解三管齐下之下，二万多人的二路军将士剩下不足两千人返回总部驻地。在此情况下，吉东、北满省委决定抗联部队实行战略转移，大部分进入苏联休整，小部分留下分散坚持斗争。至此，牡丹江地区抗联的抗日斗争经十多年的艰苦战斗进入低潮。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1时，苏联远东红旗第一集团军和第五集团军百万雄师越过国境经数日行军作战，逐步逼近牡丹江的外围地区。日军妄图凭借一江之险做垂死挣扎。8月16日凌晨，苏联红军以坦克为突击部队，向龟缩在牡丹江城区的日军发起最后攻击，当太阳落山的时候，红旗第一集团军司令部向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发出了牡丹江城区被攻克占领的战报。在这场攻城战中，击毙日本关东军四万余人，苏联红军也付出了很大牺牲。座落在铁岭河南山上的坦克纪念碑和虹云桥南头的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就是牡丹江市人民对为解放牡丹江而英勇献身的苏联红军烈士的深切怀念和敬仰。当年进入苏联休整的抗联部队，经过几年休整，军政素质大大提高，此时，随苏联红军投入解放家乡的战斗，并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实际接管了牡丹江。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发布七道命令，命令吕正操、张学思、李远昌、曾克林等部队进入东北协助苏军作战。这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正规部队首次进入牡丹江。牡丹江地区的原抗联部队统编到党中央统一指挥下的武装力量之中，并成为后来巩固和建立东北根据地的重要力量。

(三)

1932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一踏入牡丹江，就遭到牡丹江抗日武装的迎头痛击。

1932年2月17日，日军佐佐木部队长，率所部700余人，包括骑兵、炮兵，没受任何阻拦占领了海林镇。原宁安保安总队长刘万奎改编的抗日武装——自卫队，在驻地五虎林得到这一消

息，当天即派出侦探到海林镇侦察敌情。2月19日晚，刘万奎率1800多名自卫队员三面包围了海林镇。侵略者气焰极为嚣张，夜里大脱大睡，半夜时分，刘万奎发出进攻命令。刘万奎双手持枪率先从北门攻入，直插佐佐木司令部驻地——毓顺公司，紧接着东西两路也冲进镇内，分兵扑向和源永、多和成、和汇东、同兴隆等日军驻地。不可一世的日军受到突然袭击，狼狈逃窜到西北岭顶。佐佐木部队长只穿着睡衣便匆忙逃命，他的全套军服、帽子、皮靴、战刀、以及他老婆的睡衣、木履、梳妆用品、八寸半身照片全丢在卧室的桌子上和地上。刘万奎集合队伍乘胜追击。逃至山顶的日军组织兵力反击，并向镇内打炮。刘万奎为防天亮受飞机轰炸，下令撤出阵地返回五虎林驻地。

这次战斗，打响了牡丹江地区抗日武装抗击日军侵略的第一枪。不仅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纸老虎本质，也显示了牡丹江人民保卫家乡的决心和力量。3月中下旬，日军又增派天野少将部队和驻守敦化的独立守备队步兵第六大队上田支队600多人分兵两路合围宁安，企图将救国军扼杀，经小龙湾墙缝阻击战，日军被歼70余人，途经松乙沟，又被救国军一把火烧死20多人，窜入宁安县城的日军未敢久留，意欲逃往海林乘火车返回哈尔滨，在关家小铺又遭抗日武装伏击，丢下100多具尸首逃回海林。惊魂未定的日军在海林镇内龟缩三日乘火车逃向哈尔滨，在高岭子一带又受到铁路工人游击队的重创，包括天野少将在内的200多日军被击毙，只剩下30多人落荒而逃。这一系列战斗，使天野少将成为在牡丹江境内被击毙的第一个日军高级将领。

4月末，日军两个师团，一个旅团，加上近千人的骑兵重新踏入牡丹江，以近400名侵略者被歼灭的代价，占领了牡丹江站。之后，每前进一步，都受到抗日武装的顽强抵抗，付出沉重的代价，历时半年多，才占领了牡丹江地区的主要城镇。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占领了牡丹江地区，牡丹江人民的抗日斗争也随之以各种方式在牡丹江的每寸土地上展开。牡丹江人民的抗日斗争沉

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作出了积极贡献。由于牡丹江地区抗日武装力量较强，因而成为当时牵制日军兵力较多的地区。1932年底，装备精良的日本关东军驻扎牡丹江的即达两万多人，到1938年，日军在牡丹江的兵力部署达10万人之多。从日军侵略铁蹄踏入牡丹江，到1941年抗联主力进入苏联休整，牡丹江的抗日武装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数千次，消灭了大量的日伪军。特别是自发的群众抗日活动结束后，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在牡丹江广阔的地域内，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侵略者梦想的天堂，成为埋葬侵略者的坟墓。仅据其中有较详细记载的百余次战斗统计，就击毙日军近万人。

在长达14年之久的抗日斗争中，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英雄的牡丹江人民，在作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东北正面战场上，克服气候条件、装备给养等方面难以想象的不利因素，和侵略气焰正盛、装备精良、给养充足、数倍于我的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较量，牺牲了千万优秀儿女，涌现了许许多多光照千秋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中国国民救国军”总指挥王德林，于民族危亡之际，毅然率部起义抗日，不顾年事已高，率众奋勇杀敌，使救国军成为自发抗日武装的核心；他拒绝蒋介石反共命令，聘请中共党员周保中任其前方司令部参谋长；受挫入苏联境后，又历尽周折转到香港，为抗日奔走呼号，并准备重建队伍返回东北，但不幸病逝，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著名抗联将领李延禄、周保中，临危受命，按党的指示，打入自发抗日武装，凭着大智大勇和卓越才能，成为自发抗日武装中的实际指挥员，并在自己的周围教育团结了一批骨干力量，建立党的组织，为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在其后的抗日斗争中，作为抗联的主要将领，领导了牡丹江地区乃至更广大地域的抗日斗争，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威震敌胆的“平南洋”——李荆璞，凭着朴素的民族意识，结伙举旗抗

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抗日烽火中，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成为党的优秀军事将领。朱守一，曾任中共绥宁中心县委书记和中共宁安县委书记，原是东北当时的经济政治中心沈阳一个罐头厂的经理、资本家，“九·一八”事变，他毅然抛弃优厚的生活条件，别妻离子，参加抗日队伍，并很快成为党的领导干部，为牡丹江地区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作出了很大贡献。后来按党的指示，到密山建立游击队，率部与日伪军在哈达河作战，看到一个战士三枪打死三个日军，他高兴地站起来为战士喝彩，不幸却被敌人击中。这个年仅29岁的“红色资本家”就长眠在他浴血战斗的地方。还有镜泊英雄陈翰章，他牺牲前紧靠着的那棵松树会告诉你那壮烈的时刻；优秀的党代表于洪仁、抗联队伍中的“花木兰”林贞玉、抗日小英雄姜墨林，……牡丹江千顷林海，每根松针都记录着抗日英烈们的业绩；牡丹江万里疆域，每一寸沃土都镌刻着先辈们永生的英灵。闻名遐迩的“八女投江”的故事，更如奔腾的牡丹江水一样，流传得很远很广。在这个英雄群体中，年龄最大的是指导员冷云，牺牲时23岁，年龄最小的是王惠民，牺牲时年仅13岁！她们在家乡危难之时，以超乎常人的意志和情怀，毅然用女性最美的青春年华，为牡丹江抗日斗争，在全民族的抗日斗争史上，写下了最壮丽的篇章。

牡丹江的抗日斗争，坚持了长达十四年之久。十四年的抗日斗争，不仅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消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更重要的还在于，当民族危亡之时，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不抵抗政策的反动立场，使东北大好河山和数千万骨肉同胞沦陷敌手。而代表全民族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毅然担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特别是当时在东北党的力量还很弱，武装力量几乎为零的形势下，动员党的优秀儿女，动员骨肉同胞，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独立地领导起东北的抗日斗争，以千万党的优秀儿女的生命，使党在东北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东北抗日斗争的实际领导力量。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东北的抗日斗

争遭受到很大的曲折，牡丹江地区的抗日斗争也是如此。但由于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牡丹江地区坚持抗日斗争的社会基础和长期影响，苏军解放牡丹江后，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很快在牡丹江站稳了脚跟，并成为实际的主导力量。而国民党自“九·一八”事变，实行不抵抗政策，之后，实际并没有真正的武装力量在这一地区存在，只是于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临时委任投降日寇的伪军和土匪。虽然国民党利用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取得了接收东北的合法地位，并很快占领了东北的主要交通干线和大中城市，而牡丹江地区除一些国民党特务与伪军、土匪勾结外，没有被国民党正规武装部队占领。而那些乌合的国民党土匪，其实力与在苏联经几年整训的数千人的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根本不能相抗衡，从而，为党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提供了坚实的先决条件，为解放全中国建立了一块巩固的根据地。这就是党领导牡丹江的抗日武装及其十四年抗日斗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是千万优秀儿女用青春和热血换来的历史地位。

日寇猖狂，侵我海宇，狼烟遍地起。

工农兵学商齐奋起，抗日旗帜高高举。

为伟大祖国光荣，为民族自由独立。

黄帝子孙好儿女，前赴后继争杀敌。

哪管饥饿疲乏，断指裂肤，

不顾暴风烈日，雷电雷雨。

捐躯轻鸿毛，荡寇志不渝。

倭奴罪恶须清除，索还血债一笔笔。

同志们：安息！

踏着你们洒下的血迹，誓将民族解放进行到底。

前面就是胜利！前面就是胜利！

那是我们伟大光辉永不褪色的业绩。

这是著名抗联将领周保中于1939年3月20日，在牡丹江畔抗联密营为悼念抗日烈士写的一首《挽歌》。从那时到现在整整

60年，烈士们为之流血牺牲的“胜利”早已实现；伟大的中华民族已不再是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我们牡丹江这块光荣的土地，也和全国一样，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已经成为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并逐渐向富强、文明的美好未来迈进。我们今天追抚这段历史，既是告慰先烈，更是激发家乡人民发扬革命先烈的英雄精神，把牡丹江建设得更加美好。牡丹江这块英雄的土地，明天一定更加美好。

罄 滔

竹 天

难 罪

书 行

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统治

徐福仁

1932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牡丹江，为达到长期霸占牡丹江使其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对牡丹江人民进行了野蛮的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统治。

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后，为了加强对东北人民的殖民统治，于1932年3月扶持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州国。12月伪满政府公布了保甲法。保甲制度是旧社会“十家连坐”制度而来的，是警察局的下属，负责缴枪、发居民证和集家，“十家连坐”就是一家违法，邻里十家受罚，这些权力归保长所有，保长多为地主豪绅担任；1936年7月，为了强化治安，割断人民与抗日武装的联系强行归屯并户，建设“集团部落（俗称人圈），把各地零散的住户强行迁居集团部落。“集团部落”建设规模较大，统一设计，统一图纸，四周挖壕沟，架铁丝网，修炮台，装电话，监管极严。在集团部落里，依保甲法组织自卫团，派警察和伪军对居民严加管制，对抗日武装进行经济封锁和镇压，粮食、服装、医药、生活必需品等一律禁止民间自由流通，一切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如有把粮食供给抗联者一律枪杀，并连坐邻里，平民不准吃大米，如被特务发现，视为“经济犯”，轻者坐牢，重者杀头。

为了镇压部落内的居民反满抗日，日伪政权制定了一系列刑